

# 城市更新中的反绅士化现象研究

## ——基于温哥华唐人街反绅士化运动的实证

Anti-gentrification in Urban Renewal: A Case Study on the Anti-gentrification Movement in Vancouver Chinatown

唐凤玲 TANG Fengling

**摘要** 绅士化作为后城镇化、城乡转型的一种典型的地理空间与社会现象,已经成为学术领域备受关注的热门课题。选取温哥华唐人街作为研究案例,以揭示反绅士化运动对城市的影响。将温哥华唐人街反绅士化运动划分为3个阶段,分别是:以抵抗贫民窟清理为目标的反绅士化阶段、以抵抗文化异化为目标的反绅士化阶段、以抵抗生活成本提高为目标的反绅士化阶段。在此基础上,提出反绅士化运动一方面具有横向巩固联盟、纵向参与加深和灵活的组织机制等特征,另一方面也有其局限性。最后,从政府引领、贫困补偿和社区建设3个角度对我国城市更新提出可借鉴的启示和经验。

**Abstract** As a typical geographical space and social phenomenon of post-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gentrifica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field. Chinatown in Vancouver is selected as a case study to reveal the impact of anti-gentrification movement on the city. First, the anti-gentrification movement in Vancouv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resisting slum clearance, resisting cultural alienation, resisting the increase of living costs. Then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anti-gentrification movement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consolidation alliance in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deep participation in the vertical dimension, and flexible organization mechanism. However, the anti-gentrification movement also has its limitations. Finally, from the three points of government guidance, poverty compensation,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t puts forward enlightenment and experience to urban renewal in China.

**关键词** 绅士化;反绅士化;城市更新;唐人街;温哥华

**Key words** gentrification; anti-gentrification; urban renewal; Chinatown; Vancouver

文章编号 1673-8985 (2022) 02-0155-07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 supr. 20220223

随着新自由主义城市化思想在西方逐渐兴起,绅士化作为后城镇化、城乡转型时期典型的地理空间与社会现象<sup>[1]</sup>,在西方已经被看作是今后城市发展的重要策略<sup>[2]</sup>,成为学术领域备受关注的热门课题。近年来中国逐渐进入城镇化的下半叶,以城市更新为标志的城市发展和转型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赶超战略,需要城市更新创新性发展”,然而在此过程中,地方权力寻租显现,绅士化势力与民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sup>[3]</sup>,反绅士化势力呼之欲出。类似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加济公园 (Gezi Park) 事件<sup>[4]</sup>、英国伦敦拯救唐人街运动<sup>[5]</sup>、意大利米兰电车骚乱<sup>[6]</sup>等经常占据国外新闻热点的反绅士化事件在我国也逐步显现;包括南京市“老城南”事

件<sup>[4]</sup>、昆明市“94号院”<sup>[7]</sup>等。作为新的研究角度,目前国内对于反绅士化运动研究尚少,但其对丰富国内城市更新的研究视角有着重要意义。

### 1 关于反绅士化概念的概述

反绅士化的研究是依托于绅士化而言的。“绅士化”这一概念由Ruth Glass于1964年提出,用以描述伦敦内城工人阶级社区被中产阶级逐渐侵入的现象,而后“全球绅士化”逐步成为西方奉行的城市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一直以来反绅士化与绅士化相伴而生,二者此消彼长,共同塑造了城市空间<sup>[4]</sup>。

尽管对绅士化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但学术界对于反绅士化 (anti-gentrification)

#### 作者简介

唐凤玲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504381700@qq.com

注释: ① 2013年5月27日起,伊斯坦布尔民众聚集在塔克西姆广场,抗议政府准备拆除加济公园兴建商业中心和兵营。该事件源于城市规划问题,后演化为个体对政府的挑战运动。

② “伦敦拯救唐人街运动”表现为一系列的政府与居民的对抗活动。早在2004年,华人积极分子和企业家于就曾发起拯救伦敦唐人街运动,反对将一座大楼改建为购物中心。2005年年初冲突升级,对唐人街的更新改造计划的极度不满,最终引发了政府和民众的对抗。

③ 2007年4月12日,数百名中国移民在米兰唐人街与意大利警方发生一系列的暴力事件,受伤的警察和华人移民大约20名。这是意大利第一次由人们通常认为的“沉默社区”组织和发展起来的种族骚乱。

④ 2009年初,南京市推出了大规模危旧房改造计划,南捕厅一带传统民居遭到大规模的破坏,随着居民运动的深入,中央政府、社交媒体等力量纷纷介入,最终使地方政府妥协,改变了政府对老城南街区的再开发计划。

⑤ 2008年昆明市全面启动城中村拆迁计划,“94号院”是其中的项目之一,居民因不满地方政府强行拆迁行为采取了诸多反抗措施,最终地方政府迫于压力停止该项目。

尚未有统一明确的定义。反绅士化指与绅士化相反的现象,即在城市中心区复兴过程中中产阶级替换现象的减慢或者停滞现象,常伴随着城市空间更新的停滞和周边社区居民发起的反绅士化运动<sup>[5]</sup>。目前对反绅士化的研究既包含可见的部分,如社区运动、城市更新的停滞,也包含不可见的部分,如城市公共政策的调整和城市权利的再分配。此外,反绅士化运动过程可分为日常性对立(如南京“老城隍”事件)和冲突性对立(如加济公园事件、伦敦拯救唐人街运动)两种,依据其具体的背景和情景,二者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化。Mele<sup>[6]</sup>认为,反绅士化的发起对象主要是当地居民组织,常常针对政府更新计划、大型房地产开发等商业绅士化行为而产生。Loretta Lees等<sup>[7]</sup>认为,居民反对绅士化的本质是为了维护自身生存,即维护自己避免承受因绅士化产生的生活成本上升所带来的贫困影响,是为了维护可以支付的生活成本(affordable life)。

唐人街这个世界性的地理学现象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大量种族歧视的意味,目前普遍面临治安混乱、种族对立、社区衰败、人口流出、贫穷集中的问题,作为少数族裔聚集区的代表,唐人街是种族主义的适应性机制<sup>[8]</sup>。传统的唐人街常常位于大城市中心区附近,因而与城市中心区更新交织在一起,也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最为复杂的区域<sup>[9]</sup>。当前对于唐人街绅士化的研究普遍集中在阶层替换和空间衰败方面,缺乏从反绅士化角度对唐人街城市更新中出现问题的研究(见表1)。

## 2 温哥华唐人街反绅士化现象的3个阶段

温哥华唐人街是北美第二大唐人街、加拿大境内最大的唐人街,同时也是北美保存形态最为完整的唐人街,在北美的少数族裔聚集区中有极强的代表性。作为世界范围内典型的移民城市,高昂的土地价值、持续的移民热潮使绅士化现象在温哥华市范围内持续推进,但唐人街却是整个城市中绅士化程度最低、反绅士化现象最集中的区域<sup>[14][15]</sup>(见图1-图3)。其所在的市中心东端区也是温哥华市低收入

人口的集中地,历来毒品交易、性交易、抢劫盗窃等治安问题猖獗,成为城市的“心头大患”。Strathcona社区空间上毗邻唐人街,因居住了较多华人而被视为唐人街的延伸空间,常常被贯以与唐人街相同的印象,即不受欢迎、充满危险、不道德和不卫生。本文选取温哥华唐人街作为研究案例,总结其反绅士化过程的演变特征,以期温哥华市的长期努力为我国旧城更新带来启示和经验。

温哥华唐人街是1886年大火以后发展起来的。1923—1947年实施的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ct<sup>®</sup>使华人迅速在唐人街集中。1967年加拿大政府颁布的新移民政策推动唐人街由封闭的华人住宅区向多元的文化旅游商业街转型,大量富裕华人新中产阶级移民逐渐迁入位于温哥华市郊区的列治文,唐人街的华人逐步流出、迅速走向衰败。直至今日,温哥华唐人街已成为加拿大范围内最贫穷和最封闭的社区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改变唐

人街一直以来威胁公众安全的形象,温哥华政府及唐人街社区启动了更新改造计划,逐步加速唐人街的商业化转型<sup>[15]</sup>(见表2,图4-图6)。

自排华法案废止、华人权益恢复之后,唐人街的种族矛盾逐渐弱化,绅士化脚步加快,但具体建设过程仍受到了强烈的反绅士化阻挠。这一过程中反绅士化现象可以分为以抵抗贫民窟清理为目标、以抵抗文化异化为目标、以抵抗生活成本提高为目标3个阶段(见表3),这3个阶段与温哥华市的社会、经济和区域政策相结合,使唐人街的更新改造带有鲜明特色。

### 2.1 1960s—1980s:以抵抗贫民窟清理为目标的反绅士化阶段

1929—1947年严格的移民政策使唐人街和邻近的社区基本没有建设发展,市中心用地紧张、中产阶级居住税基丧失、住房环境恶化和贫困人口集中,这些因素都加剧了唐人街

表1 国外关于唐人街反绅士化的主要研究及其观点总结

Tab.1 Main research on anti-gentrification in Chinatown and summary of viewpoints

学者(年份)	主要观点
Leeman Jennifer, Gabriella Modan (2009) <sup>[10]</sup>	华盛顿唐人街的绅士化主要产生于企业对中国文化、语言和建筑的商品化,由于中产阶级游客和居民的迁入,导致社区生活成本激增、大量原住民被迫搬走
Chan Kwok (1986) <sup>[11]</sup>	1980年代蒙特利尔唐人街的绅士化和再开发剥夺了华人的生存空间,以便为省级、联邦和私人发展项目让路
Nicola Montagna, Panos Hatziprokopiou (2012) <sup>[12]</sup>	通过研究伦敦“拯救唐人街运动”和米兰唐人街“电车骚乱”后提出两次居民自发的反绅士化运动都是为了反对高端商业的植入对唐人街造成的文化冲击及对社区居民的负面影响
Kay Anderson (2018) <sup>[13]</sup>	唐人街的反绅士化运动一定程度上减慢了绅士化速度,但长远来看却在削弱唐人街的文化特征和种族聚居性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图1 温哥华唐人街区位图  
Fig.1 Location of Chinatown in City of Vancouv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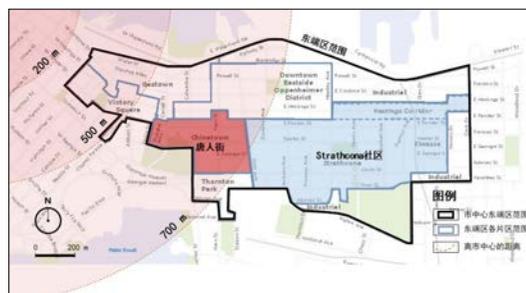


图2 唐人街、Strathcona社区及东端区位置关系示意图  
Fig.2 Location of Chinatown, Strathcona and the East End in City of Vancouver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注释: ©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Act (《华人移民法案》,又称“排华法案”)严格限制了华人移民进入加拿大,使得移民增长速率迅速下降,该法案于1947年废止。在此期间,由于种族主义政策严苛,相较于城市其他空间的对华人的不平等对待,唐人街所提供的文化、经济和种族归属作用使得华人迅速在此集聚。

的“污名化”现象,甚至使其被描述为需要手术切除的“城市溃疡”和肮脏、拥挤的贫民窟。直到1962年公布的新移民标准推行,大量移民才迁入了一直以来作为唐人街空间延伸Strathcona社区。

1950s至1960s期间,温哥华市发起了重建计划以解决所谓的城市“破旧”地区的问题,又被称作城市空间理性化安排项目<sup>①</sup>。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反绅士化运动包括阻止了Strathcona贫民窟清理项目的第三阶段和横穿唐人街的高速公路建设。

Strathcona贫民窟清理是典型的由政府主导的城市更新项目,尽管这期间造成大量居民的流离失所,但政府只对原住民提供少量补

贴(见表4)。Leonard Marsh在其撰写的《重建邻里:温哥华关键地区贫民窟清理和城市重建示范项目报告》中提到“购置和清理现有住房,只会重新修建公寓、排屋和小套房3种类型作为出租住宅,却没有可供拆迁居民居住的私人住宅建设计划。在没有征求公众意见的情况下,市政府冻结居民的房屋维修许可(repair permits)并停止对这片区域的日常维护,对每户只提供6 000—8 000加拿大元的拆迁补偿。事实上对当地居民而言重新安置新家至少需要14 000—21 000加拿大元的花费,但即使提供足够的安家费用,也很难弥补其损失”<sup>[22]21</sup>。唐人街反绅士化活动人士陈雪莉回忆:“自1958年以来,温哥华市不断拒绝居民改善住房质量的申请,这是因为城市一直秘密推行贫民窟清理计划,尽管我们从未想过自己是贫民窟的一部分”<sup>[2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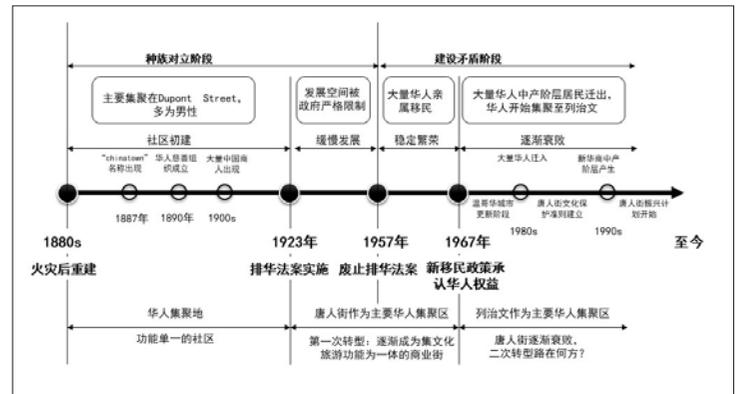
1967年公布的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因其穿过中国传统园林中山公园附近的上海路,使唐人街的商业核心完全与居住区域分隔,因此遭到了居民的激烈抵抗。起初抗议范围只停留在周边居民和商人,后因备受媒体关注,以建筑师、规划师、大学教授和学生组成的社会联盟<sup>[24]545</sup>纷纷加入了此次运动,强调唐人街的历史文化作用、主张构建多元文化的温哥华,最终吸引了华人移民共同捍卫华人利益<sup>[25]</sup>。

Strathcona贫民窟清理项目的第三阶段和高速公路项目在1968年停止,政府认识

表2 温哥华人口特征统计  
Tab.2 Demographic statistics of Vancouver

人口统计项目	唐人街	Strathcona 社区	温哥华市	
2016年总人数/人	1 821	12 585	631 486	
2016年原住民比例/%	4.20	6.70	2.20	
2016年人口密度/(人/hm <sup>2</sup> )	108	33	54	
建筑类型/%	单户独立屋	0.00	5.00	15.00
	双户复式屋	2.00	13.00	24.00
	公寓(小于5层)	24.00	44.00	32.00
	公寓(大于等于5层)	74.00	38.00	29.00
家庭结构/%	有孩单户家庭	12.00	17.00	29.00
	无孩单户家庭	21.00	16.00	23.00
	多户同住家庭	0.00	1.00	3.00
	室友同住家庭	6.00	5.00	7.00
语言能力/%	单人户	61.00	61.00	38.00
	英语	91.00	82.00	93.00
	中文—粤语	14.00	22.00	16.00
	法语	13.00	10.00	10.00
族裔/%	中文—普通话	6.00	9.00	11.00
	白种人	39.54	35.08	45.27
	华裔	14.55	22.77	26.50
	东南亚裔	3.84	3.81	2.70
	菲律宾裔	3.84	0.95	5.78
	原住民	5.78	7.87	2.33
	黑人	6.04	2.34	1.01
	其他	26.41	27.18	16.41
年龄/%	0—24岁	11.10	16.80	23.20
	25—39岁	36.40	25.40	28.20
	40—59岁	24.40	29.80	26.80
	60岁以上	28.10	28.00	21.80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2016年人口普查, <https://vancouver.ca/files/cov/chinatown-demographic-profile.pdf>。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6], [17]385, [18]整理。

注释: ① 温哥华市重建计划("rationalization project" in Vancouver)进行了20多年,主要针对唐人街及其所在Strathcona社区的大部分住宅区进行拆除和重建。期间爆发了多次激烈的反绅士化运动,这些运动让唐人街和Strathcona社区紧密团结起来,深刻影响到地方政治,极大地改变了温哥华市的城市治理方式。

表3 温哥华唐人街反绅士化的三个阶段

Tab.3 Three stages of anti-gentrification in Chinatown of Vancouver

反绅士化阶段	时间	背景	主要目标	主要运动	主要参与主体	结果	影响
以抵抗贫民窟清理为目标的反绅士化阶段	1960s—1980s	唐人街发展的顶峰时期，大规模城市更新项目层出不穷	反绅士化运动意在阻止以贫民窟清理为目的的城市再开发项目，强调唐人街的文化价值	反对 Strathcona 贫民窟清理项目 (Strathcona slum clearance) 第三阶段和横穿唐人街的高速公路建设	早期遭到居民和附近商人的剧烈抵抗，后吸引建筑师、规划师、大学教授和学生，以及华人移民的参与	城市更新速度减缓	唐人街作为历史文化遗产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以抵抗文化异化为目标的反绅士化阶段	1980s—1990s	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极大限制了唐人街的发展	反绅士化现象占据优势，坚决反对文化异化，强调严格文物保护标准	制定了全面的历史保护协定运动	政府部门利用文物保护制度推动，具有文化信仰的老一辈华人商人和居民参与	发展逐步冻结	全面的历史保护协定后来被推翻，唐人街进入快速绅士化时期
以抵抗生活成本提高为目标的反绅士化阶段	1990s至今	唐人街振兴计划极大推动了绅士化进程	意在反对商业绅士化所引起的房价或租金上涨以及日常生活消费的物价上涨	反对 105 Keefer 运动	政府利用公租房等调控手段介入，附近居民和商人进行小规模反绅士化运动	改造更新计划几近停滞	社会住房和贫困人口集中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9-20], [21]123整理。

表4 Strathcona贫民窟清理项目的三个阶段

Tab.4 Three stages of reconstruction plan in Strathcona

阶段划分	时间	影响	政府补贴
第一阶段	1960—1963年	860人流离失所，30英亩(约12hm <sup>2</sup> )住宅和商业建筑被拆除	无补贴
第二阶段	1963—1965年	大量贫民窟被拆迁	无补贴
第三阶段	1965—1980s	2000多人流离失所	少量拆迁补偿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17]389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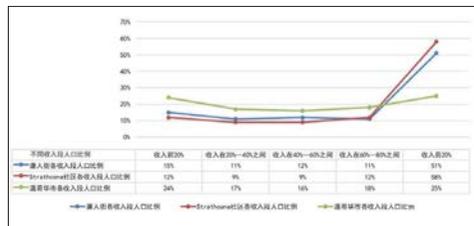


图5 不同收入段人口比例统计图

Fig.5 Proportional statistics of different income segments in City of Vancouver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2016年人口普查, <https://vancouver.ca/files/cov/chinatown-demographic-profile.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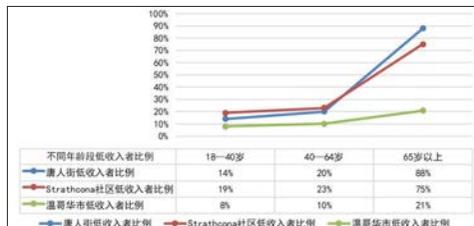


图6 不同年龄阶段低收入者比例统计图

Fig.6 Proportional statistics of low-income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City of Vancouver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2016年人口普查, <https://vancouver.ca/files/cov/chinatown-demographic-profile.pdf>。

到贫民窟清理项目可能会摧毁该地区的居住社区,如果脱离华人居住社区,唐人街就不可能继续存在,自此,唐人街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地位逐渐受到认可。Lai将阻止城市更新建设的成功归功于1962年后的华人移民,称之为“一种受过教育的新型华人移民”<sup>[21]125</sup>,这类人群构成了唐人街早期的新中产阶级,也是这场反绅士化运动的中坚力量。迫于各方面压力,市政府最终取消了高速公路修建计划,反绅士化势力取得阶段性胜利,但温哥华市也成为北美地区唯一没有市区快速路的城市,对城市交通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尽管Strathcona社区得到了暂时的保护,但包括唐

人街在内的东端区,其恶劣的居住环境并未改善,贫穷人口不断集中,时至今日已成为整个北美地区最为落后的社区之一。

## 2.2 1980s—1990s:以抵抗文化异化为目标的反绅士化阶段

随着时间的发展,曾因“中国化”而被污名化的唐人街,逐步将“中国化”作为文化商品,力图将这一街区恢复为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1971年,为了响应社会对唐人街的态度转变,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通过了新的区划(new zoning regulations),划定唐人街的商业地区Pender街和邻近的街区Gastown为省级文化

遗产保护区。新区划将唐人街划分为HA—1区和HA—1A区并采取分区保护策略,目的是“承认该地区的民族特质,并确保唐人街的历史、建筑和文化特征得到保护、恢复和维护”<sup>[26]</sup>(见图7)。这一规定严格限制保护区内建筑的改造开发,即使是产权所有者也没有改造建筑的权利,对唐人街的持续经济活力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当地商人和投资者声称,这一政策使唐人街无法随着社会资本而变化,也无法适应温哥华作为全球城市的新地位,最终“冻结”了这一地区的发展。

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反绅士化势力明显压过了绅士化力量。随着大量中国移民的涌入,来自更高社会阶层的华人移民的首选居住地转变为温哥华郊区的列治文(Richmond)<sup>[22]19</sup>,唐人街几乎吸引不到投资,也不再是华人世界的中心<sup>[24]548</sup>。不仅如此,温哥华新区划中规定的保护区范围严格限制了唐人街的经济发展。区划(zoning)和再区划(rezoning)制度将土地交易控制在较小的土地出让规模,使大规模城市更新项目的数量急剧下降。

另一方面,缓慢进行的绅士化依旧未能降低投资者对唐人街的商业化热情。唐人街文化地位的提高更是引起了包括市中心东端区在内的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外国投资者毫不避讳地提倡“必要的中国化”(essential Chineseness),更自豪地宣扬“想看看温哥华唐人街变成有东方触感的Granville Island

商业街”<sup>⑤</sup>。这些有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产业形式和建筑风貌(如西班牙式建筑的酒吧等),极大地激怒了具有乡土情感的华人居民以及本地商人,认为当前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摧毁了老一代华人的身份认同<sup>[30]159</sup>。

20世纪80年代,一场意在放宽文物保护力度、“解冻社区”和保护传统中国文化的居民运动在唐人街悄然兴起,最终成功解除了反绅士化力量的政策掣肘。这场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以商人为主,普通居民参与较少,主要形式以市政厅和商人联盟之间的对话为主。在大量反绅士化力量与市政厅的交涉下,终于明确“唐人街的保护对象是居民而不仅仅是建筑”这一观点,成立了唐人街复兴委员会<sup>⑥</sup>作为复兴改造的负责机构。最终于1994年达成了一项新的政策,取消了全面的历史保护协定,只保护社区内的特定建筑物和地区。在之后的数年内,多项重建计划在唐人街展开,包括唐人街广场、Keefer附近的购物中心、香港汇丰银行(Hong Kong Commercial Banking, HSBC)的新大楼、中国文化中心的扩建以及大量私人住宅的建设等<sup>[30]160</sup>,这些项目使唐人街进入了快速的绅士化时期。

### 2.3 1990s至今:以抵抗生活成本提高为目标的反绅士化阶段

随着温哥华政府陆续推出的多项唐人街振兴计划,唐人街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sup>⑦</sup>。

唐人街已经产生了一批为非本地区消费者服务的零售商业,包括各种高端精品店和餐饮店,其目标客群往往是比唐人街传统居民更富有、更年轻的英语居民。这些独立和前卫的消费空间得到了博客、社交媒体(如Yelp、Instagram等)的推荐,成为当地火爆的“网红商店”<sup>[30]172</sup>,推动了周边商业的发展。这个阶段唐人街的反绅士化运动主要关注焦点在反对商业绅士化所引起的房价或租金上涨以及日常生活消费的物价上涨。以反对105 Keefer运动为例:105 Keefer位于唐人街的核心区<sup>[31]</sup>, Beedie Living公司提出将其建

设为高端商业综合体的再区划计划,引起了附近居民的不满(见图8)。在唐人街关注组(Chinatown Concern Group, CCG)和唐人街行动组(Chinatown Action Group, CAG)的交涉下,活动参与者呼吁温哥华议会驳回Beedie Living公司的再区划申请,借助社交媒体的影响,该运动引起了广泛关注。

振兴项目中的高端商场带动了地区的发展,却难存活长久。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张的高端商场就不断受到周边治安混乱的骚扰,其正常营业也受到附近居民的投诉和抗议。居民认为高端商场抬高了日常消费的物价,更替换了居民更为熟悉的家庭作坊(mom and pop store)<sup>[32]210-215</sup>。

此外,原本意在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公共政策,也极大地阻碍了唐人街的更新和发展。放宽新建项目高度限制、提升开发强度原本是政府通过引进新居民从而实现社区活化的一项建设策略,却因为引起了原住民对失去可负担住房的恐慌,迫使政府不得不修建大量的社会住宅,截至2018年末,温哥华市每年供应的社会住房达到1 200套<sup>[33]</sup>。除了直接进行社会住房供应,政府陆续推出了许多保障低成本社会住宅建设的政策,包括低成本的SRO住房(single room occupancy housing)建设、管控SRO住宅被侵占和替换的单人居所细则(Single Room Accommodation)<sup>[34]</sup>。不仅如此,政府还提出较多减缓绅士化的强制性公共住房要求,强调开发商建设必须满足20%公共住房比例,甚至提出“房地产税”(real estate windfall tax)及“房屋空置税”(empty home tax)<sup>[35]</sup>多项调控政策。但是持续公共住房的建设却并没有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相反,贫困人口在唐人街的集中程度越来越高。迄今为止,包括唐人街在内的市中心东端区已经陷入恶性循环,即更多的社会住房和更集中的贫困人口。

### 3 反绅士化运动特征总结

#### 3.1 横向联盟巩固——广泛的反绅士化参与者



图7 唐人街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图  
Fig.7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area in Chinatown of Vancouver HA-1 and HA-1A district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7-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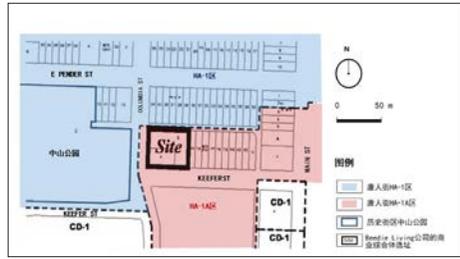


图8 Beedie Living公司建设项目选址示意图  
Fig.8 Location of Beedie Living's construction project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在温哥华反绅士化运动的过程中,越来越广泛的参与者加入到此类运动中。相对于由商业团体和地方政府形成的绅士化力量,反绅士化力量的参与者更加多元。总的来说,其主要参与者包括:当地居民和商人、华人市民、知识精英、政府部门、新闻媒体等。根据这些参与者各自的参与程度和价值诉求,可分为利益涉入型参与者、民族涉入型参与者、价值涉入型参与者及非确定型参与者。

参与者常常会深陷于反绅士化和绅士化力量的矛盾之中,在不同的情境下其立场也会发生相应转变。其中以政府为代表的非确定型参与者表现出最复杂的参与性,这是因为政府既有推动城市增长的动机,也有稳定城市稳定职责<sup>[36]22</sup>。在以新闻媒体和知识精英为代表的价值涉入型参与者的关注下,政府逐渐从绅士化力量的推动者转变为反绅士化力量的参与者,后因为历史文化保护和社会住房建设,政府成为反绅士化的主要力量。因此,反绅士化运动的参与者,只是在具体实践中出现的特定力量,而并非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固定结构(见图9)。

注释: ⑤ Granville Island商业街区位于温哥华市格兰威尔岛,原本是工业区,1980s后逐步转型为一个多元文化街区。现有多民族特色的艺术学校、公共集市、艺术家工坊、餐馆等,成为加拿大境内负有盛名的文化街区。

⑥ 唐人街复兴委员会(Chinatown Historic Area Planning Committee)成立的目的是对唐人街的改造提供建议,该委员会由大量居民组织构成,包含华人文化中心(Chinese Cultural Center)、唐人街业主协会(Chinatown Properties Owners)等。

⑦ 1990s唐人街主要规划政策的上位规划包括Downtown Eastside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市中心东区社区发展计划》、Downtown Eastside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Plan《市中心东区经济复苏计划》、Downtown Eastside Housing Plan《市中心东区住房计划》等。专项的振兴计划包括Chinatown Community Plan《唐人街邻里计划》、Chinatown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Strategy《唐人街经济振兴战略》等。

### 3.2 纵向参与加深——反绅士化运动逐渐由对抗性转为日常性

随着时间推移,反绅士化运动的对抗事件由大变小、运动频率越来越高。在早期,大型的城市更新项目才往往引起反绅士化运动,而后普通商场的入驻甚至是网红餐厅的开张都会引起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冲突。

在早期的地方政治系统内,原住民抵抗绅士化运动常采取的是一种跨层级和超地点互动的的作用方式,积极寻求精英、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的帮助。随着这种“横向联盟”方式的不断完善,纵向的合作深度也不断加强,以唐人街关注组和唐人街行动组为代表的居民社区组织不断兴起,许多社区网站和媒体也成为反绅士化的重要手段<sup>[30][173]</sup>,居民开展反绅士化运动的成本也越来越低。因而,引发反绅士化运动的重点事件规模正在不断降低,运动形式由原来激烈的对抗性转变为日常性活动,参与居民人口越来越多,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更加深远。

### 3.3 灵活的组织机制——社区组织的粘合作用

在反绅士化过程中,社区组织通过凝聚不同类型的参与者<sup>[37][552]</sup>,构建出统一的反绅士化阵线,对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协调,最终达成有效沟通。

在反对Strathcona社区改造过程中,华人慈善组织(Chinese Benevolent Association,

CBA)主要负责对华人居民的日常援助(包括经济援助和语言援助)<sup>[14][160]</sup>。在反对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华人慈善组织多次组织居民的抗议活动,与温哥华市政厅交涉,并且为流离失所的居民提供住房补助及其他经济援助。在这一组织模式成功运用之后,Strathcona业主和租户协会(Strathcon's Property Owners and Tenant Association, SPOTA)也逐步成立,代表新一代加拿大华人移民来干预城市和联邦政府的更新计划<sup>[21][126]</sup>。SPOTA除了公开谴责政府行为、组织居民活动外,多次在市政府议会上强调唐人街既是文化遗产保护区,也是独立社区。此外,SPOTA巧妙地利用公共领域推进其事业,多次邀请政客进社区与居民访谈,被誉为“居民意愿最合适的传达方式”。

### 3.4 反绅士化的局限性——联盟的反复性和运动的局限性

一方面,城市空间的多元使用价值决定了反绅士化运动具有广泛的人群基础,其中间力量来自于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利益的保护行为。这就使反绅士化运动参与者的参与意愿和价值追求总是存在隐性分歧,当部分参与者的诉求达成时,反绅士化联盟的缔结基础将趋于削弱或瓦解,直到新的情境下反绅士化联盟重新组建。而绅士化联盟则具有一致的利益诉求,更容易保持长久稳固的关系。

另一方面,反绅士化运动往往忽略公共利益,也就造成了反绅士化运动的局限性,即脱离城市整体利益来谈自身利益,不利于城市的长远发展。温哥华市剧烈的反绅士化运动已经在较大范围内压倒了城市发展动力,让包括唐人街在内的东端区几乎陷入发展停滞的状态,对于城市整体利益而言是极大的损失。

## 4 温哥华唐人街反绅士化运动对中国城市更新的启示

随着温哥华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其绅士化和反绅士化现象一直处于不断的交锋中,实践经验不断融入新的规划实践,可以说温哥华市的城市更新是在不断与这些现象磨合和修

正中进行的。

### 4.1 政府引领——明确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反绅士化运动是新自由主义时代下的产物,因而这一力量在中国乍现,需要当局者采取开明的心态和公共力量的引导协调,以防对城市的长远发展造成影响。规划师需要同居民、NGO、社会人士进行广泛沟通,这是实现降低城市矛盾的必要途径。城市发展过程总是充满曲折的,但不能因噎废食,在改造初期政府的积极引导和约束更容易建立一个良性的城市更新机制<sup>[37][556]</sup>,为城市长远的发展打好基础。

### 4.2 贫困补偿——加强对低收入者的保护

城市问题的解决最终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规划的意义在于不断实现一种帕累托演进,在满足多数人利益的同时做好利益再分配,以保证多数人利益盈余来弥补少数群体的利益亏损,最终实现统一的发展决策并且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契约。低收入者是城市更新中的弱势群体,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更应当加强对其利益补偿,防止产生过度的阶层替换。

### 4.3 社区建设——建立良好的社区组织体系

温哥华唐人街的案例表明,尽管有广泛的反绅士化力量同盟和深度的合作组织方式,但反绅士化力量的局限性很难从根本上制约和协调绅士化力量。社区组织具有既是政策的执行者,也代表社区利益、组织居民运动与绅士化力量交锋的二重属性。我国诸多“官民对立”“恶性对抗”等事件很大程度上都与未能进行准确协商沟通有关<sup>[36][26]</sup>。因而,社区组织是政府决策和居民之间的桥梁,也是各方利益的协调者,完善的社区组织体系对于城市的长久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 5 小结

城市更新中所有反绅士化现象的现出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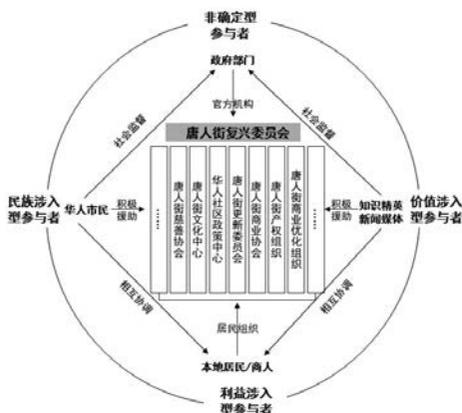


图9 反绅士化联盟组织模式示意图  
Fig.9 Organization pattern of anti-gentrification alliance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是与特定的城市更新背景相适应的,其政策都在不断的修正过程中,具有很强的问题针对性和阶段性。中国的城市更新尚处于初级阶段,内城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复杂性、滞后性和地方性。随着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国内日益尖锐的城市更新现象需要我们能够求同存异并在反绅士化问题上探索具有本土特征的解决方式。总而言之,积极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防止反绅士化现象影响城市未来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发展策略。■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南京大学中国中产化研究中心. 首届中国中产化论坛南大宣言[J]. 城乡规划, 2017 (6) :4-5.  
Research Center of China Middle-class of Nanjing University. Declaration of the first China Middle-class Forum in Nanjing University[J].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2017(6): 4-5.
- [2] SMITH N. New globalism, new urbanism: gentrification as global urban strategy[J]. Antipode, 2002, 34(3): 427-450.
- [3] 楚建群,赵辉,林坚. 应对城市非正规性: 城市更新中的城市治理创新[J]. 规划师, 2018, 34 (12): 122-126.  
CHU Jianqun, ZHAO Hui, LIN Jian. Response to urban informality: innov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in urban renewal[J]. Planners, 2018, 34(12): 122-126.
- [4] OPILLARD F. Resisting the politics of displacement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anti-gentrification activism in the tech boom 2.0[J]. Europea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2015, 10(3): 1-23.
- [5] LEES L. A reappraisal of gentrification: towards a 'geography of gentrification'[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0, 24(3): 389-408.
- [6] MELE C. Selling the lower east side: culture, real estate, and resistance in New York Cit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25-28.
- [7] LEES L, ANNUNZIATA S, RIVAS-ALONSO C. Resisting planetary gentrification: the value of survivability in the fight to stay put[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2018, 108(2): 346-355.
- [8] WONG B P. Chinatowns: persistence and change[J].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2011, 7(1): 1-5.
- [9] KNAPP A, VOJNOVIC I. Rethinking the growth machine: how to erase a Chinatown from the urban core[J]. Urban Geography, 2013, 34(1): 53-85.
- [10] LEEMAN J, MODAN G. Commodified language in Chinatown: a contextualized approach to linguistic landscape[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9, 13(3): 332-362.
- [11] CHAN K. Ethnic urban space, urban displacement and forced relocation: the case of Chinatown in Montreal[J].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1986, 18(2): 65-78.
- [12] HATZIPROKOPIOU P, MONTAGNA N. Contested Chinatown: Chinese migrants' incorporation and the urban space in London and Milan[J]. Ethnicities, 2012, 12(6): 706-729.
- [13] ANDERSON K. Chinatown dis-oriented: shifting standpoints in the age of China[J]. Australian Geographer, 2018, 49(1): 133-148.
- [14] BURNETT K. Commodifying poverty: gentrification and consumption in Vancouver's Downtown Eastside[J]. Urban Geography, 2014, 35(2): 157-176.
- [15] ANG I.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M].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16] NG W C. The Chinese in Vancouver 1945-1980: the pursuit of identity and power[M]. Vancouver: UBC Press, 1999: 99.
- [17] LEE J A. Gender, ethnicity and hybrid forms of community-based urban activism in Vancouver, 1957-1978: the Strathcona story revisited[J].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007, 14(4): 381-407.
- [18] LI P. The rise and fall of Chinese immigration to Canada: newcomers from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China and Mainland China, 1980-2000[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5, 43(3): 9-34.
- [19] MADOKORO L. Chinatown and monster homes: the splintered Chinese diaspora in Vancouver[J]. Urban History Review, 2011, 39(2): 17-24.
- [20] ANDERSON K J. Cultural hegemony and the race-definition process in Chinatown, Vancouver: 1880-1980[J]. Environment & Planning D: Society & Space, 1988, 6(2): 127-149.
- [21] LAI D C. Chinatowns: 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M]. Vancouver: UBC Press, 1988: 120-130.
- [22] MURRAY K. Making space in Vancouver's east end: from Leonard Marsh to the Vancouver Agreement[J]. BC Studies, 2011(169): 7-49.
- [23] MACKAY C. Chinatown fights slum clear[N]. Vancouver Sun, 1963-01-19 (B10).
- [24] POTTIE-SHERMAN Y, HIEBERT D. Authenticity with a bang: exploring suburban culture and migration through the new phenomenon of the Richmond Night Market[J]. Urban Studies, 2015, 52(3): 538-554.
- [25] POTTIE-SHERMAN Y. Vancouver's Chinatown Night Market: gentrifica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Chinatown as a form of revitalization[J]. Built Environment, 2013, 39(2): 172-189.
- [26] AECOM. Vancouver Chinatown economic revitalization action plan[EB/OL]. (2011-06-29) [2021-03-20]. <http://vancouver.ca/docs/planning/chinatown-economic-revitalization-action-plan.pdf>.
- [27] City of Vancouver. HA-1A district schedule (Chinatown)[EB/OL]. (2019-07) [2021-03-20]. <https://vancouver.ca/commsvcs/BYLAWS/zoning/ha-1&1a.pdf>.
- [28] City of Vancouver. Chinatown HA-1 design policies[EB/OL]. (2019-06-11) [2021-03-20]. <https://vancouver.ca/commsvcs/guidelines/C018.pdf>.
- [29] City of Vancouver. Chinatown HA-1A guidelines for non-designated sites [EB/OL]. (2018-09-18) [2021-03-20]. <https://vancouver.ca/commsvcs/guidelines/C019.pdf>.
- [30] NG M N. Representing Chinatown: Dr. Fu-Manchu at the Disappearing Moon Cafe[J]. Canadian Literature, 1999, 22(163): 157-175.
- [31] FUNG S E. The well-being of low-income, monolingual Chinese senior residents: the impact of disinvestment and gentrification in Vancouver's Chinatown[D].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12.
- [32] ENG P A, DONNELLY E. Hidden dragons: the revitalizing of Vancouver's Chinatown from humanistic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2020, 60(2): 205-226.
- [33] HIEBERT D. Newcomers in the Canadian housing market: a longitudinal study, 2001-2005[J]. Canadian Geographer, 2009, 53(3): 268-287.
- [34] City of Vancouver. Housing Vancouver strategy annual progress report and data book 2019[EB/OL]. (2019-08-30) [2021-03-20]. <https://vancouver.ca/people-programs/housing-vancouver-strategy-background.aspx>.
- [35] City of Vancouver. Almost \$40 million in empty homes tax revenue collected to date is funding affordable housing initiatives[EB/OL]. (2019-11-20) [2021-03-20]. <https://vancouver.ca/news-calendar/almost-40-million-in-empty-homes-tax-revenue-collected-to-date-is-funding-affordable-housing-initiatives.aspx>.
- [36] 陈浩,张京祥,林存松. 城市空间开发中的“反增长政治”研究——基于南京“老城南事件”的实证[J]. 城市规划, 2015 (4) :19-26.  
CHEN Hao, ZHANG Jingxiang, LIN Cunsong. Anti-growth politics in urban spati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n the southern old city event of Nanjing[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5(4): 19-26.
- [37] 曾文,吴启焰,张小林,等. 中国城市空间反增长联盟的新特征——基于昆明市“94号院”的实证分析[J]. 地理科学, 2015, 35 (5) :551-557.  
ZENG Wen, WU Qiyan, ZHANG Xiaolin, et al. The new features of anti-coalition in China's urban space: a case study of "No.94 yard" in Kunming[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35(5): 551-557.